

隐藏的风景

——英国乡村风景画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Landscape:
the Image of Peasants in
Landscape Paintings*

杨冰莹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http://www.cqup.com.cn>



隐藏的风景

——英国乡村风景画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The Hidden Landscape:

*A Study on the Image of Peasants in
English Rural Landscape Paintings*

杨冰莹 著

重庆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隐藏的风景：英国乡村风景画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
杨冰莹著. —重庆：重庆大学出版社，2016.2
ISBN 978-7-5624-9653-3

I. ①隐… II. ①杨… III. ①风景画—农民—人物形
象—研究—英国—近代 IV. ①J205.56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022941 号

隐藏的风景
——英国乡村风景画中的农民形象研究

杨冰莹 著

责任编辑：席远航 版式设计：原豆设计（李奕霖）
责任校对：张红梅 责任印制：赵 晟

*

重庆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易树平

社址：重庆市沙坪坝区大学城西路 21 号

邮编：401331

电话：(023) 88617190 88617185 (中小学)

传真：(023) 88617186 88617166

网址：<http://www.cqup.com.cn>

邮箱：fxk@cqup.com.cn (营销中心)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POD：重庆新生代彩色技术有限公司

*

开本：890/1240 1/32 印张：4 字数：96 千

2016 年 2 月第 1 版 201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624-9653-3 定价：35.00 元

本书如有印刷、装订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请勿擅自翻印和用本书

制作各类出版物及配套用书，违者必究

■ 前 言

相比于历史画、肖像画以及神话题材的作品，风景画似乎距离意识形态最为遥远。自风景画诞生之日起直至现代主义时期，风格、形式、技法等方面的分析往往成为艺术家和艺术史学者关注的重点，人们对于风景的认知也长期停留在视觉层面。然而，事实上，风景画并不是如它表面上所显示的那样“与世无争”，它绝非“中立”“自然”或“纯真”的，也并非完全客观。马克思曾提出过“人化自然”的概念，即作为客观对象的自然是被主体的意志和力量所投射、认知和改造，从而被对象化的。而风景画所再现的正是这种“人化的自然”。无论是古典主义的田园风光，还是浪漫主义的崇山峻岭，抑或消费时代的旅游胜地，风景都不是一个单纯的物体或者视觉文本，而是一个被主体不断对象化的过程。这里所说的“主体”不仅仅指艺术家本人，而更多地指向政治、经济、文化、宗教、历史、集体心理等对艺术家产生直接或间接影响的诸多因素。因此，画面中的一草一木并不是“天然如此”，而是被处于画面之外的那个“隐藏”的主体建构而成的。但这一点长期以来是被忽视的，当人们谈论风景画的时候，更倾向于对它进行一番浪漫或神秘的描绘，却很少透过它“无害而透明”的表面深究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和话语机制，而这正是本书所关注的问题。

然而，本书并无意于囊括所有风景画的类型，而仅仅将目光锁定于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英国乡村风景画中的农民形象。之所以如此选择，不仅是源于笔者自身的兴趣所在，更多地是因为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既是英国风景画完全成熟的时期，也是乡村风景画与乡村现实之间的差距最为巨大的一段时期。尤其是在 1870 至 1920 年，英国乡村遭受了前所未有的重创，农民普遍陷入了极度的困境。无论是 18 世

纪中期开始的工业革命还是自中世纪就已萌芽的圈地运动都在 18 世纪末达到了顶峰，它使土地集中在土地贵族和少数农业资本家手中，而大量农户被驱逐，他们或者因为破产而饿死，或者背井离乡到城市成为所谓的“自由农民”，或者留下来成为农场主的雇佣工人。与此同时，英国因恐惧法国大革命，而组织反法同盟，参加拿破仑战争。沉重的战争赋税使得工人阶级的生活更加贫困，而农场中的工人更是如此。1795 年《斯品汉姆兰法案》（*Speenhamland System*）使小农户承担过重的救贫税而纷纷破产，1815 年的《谷物法》（*Corn Law*）又使得全英国的劳动人民普遍陷入赤贫，诸多原因造成工人农民暴动不断，他们破坏机器、焚毁粮仓，使统治阶级和上层社会极度恐慌。

但与此同时，这一时期的英国乡村风景画却一直与现实保持着极大的差距与微妙的张力。它一方面继承了 18 世纪早期以来的理想主义传统，另一方面又出现了明显的现实化倾向：它一方面力图将农民表现为平静愉悦或者任劳任怨的姿态，另一方面又刻画他们辛劳贫苦的生活细节；它一方面迎合贵族的古典趣味，另一方面又不得不满足日益崛起的中产阶级的文化诉求。这一时期的英国乡村风景画既有庚斯博罗“茅屋门前”（*cottage door*）主题的抒情诗般的风景画，又有康斯太布尔的本土化英国风景；既有斯塔布斯笔下的穿着整洁、举止优雅的收割者，又有莫兰德所热衷的粗鄙庸俗的农民和流浪汉。在学院派的古典主义传统与风景画的本土化倾向、贵族趣味与大众文化、英国的保守主义与激进主义相互交融碰撞的历史背景下，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英国乡村风景画在理想与现实、高雅与庸俗、优美与崇高之间左右摇摆，试图寻求平衡。但总体上来看，在工业革命的成果真正反映在乡村风景画（如特纳的火车和汽船，约瑟夫·怀特的纺纱厂等）之前，英国风景画家一直都将乡村描绘为

一个平静祥和的乐园，而农民的形象不论是在休息或者工作，无论穿着整齐还是衣衫褴褛，都始终保持着平和安宁的状态，我们几乎难以相信在这平静的劳动与抒情诗式的风景背后是对法战争，粮食歉收，物价飞涨，登峰造极的圈地运动和不断爆发的农民起义。正如约翰·巴瑞尔（John Barrell）所说：“风景画所表现的农民不是他们本来的样子，而是他们应该被表现出来的样子。”¹

1. BARRELL J. 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 The Rural Poor in English Painting 1730-1840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24.

那么，为什么在艺术与现实之间会出现如此巨大的鸿沟？风景画是如何波澜不惊地隐藏了时代的动荡？是什么因素主导了农民形象的塑造？时隔数个世纪，当我们再次与康斯太布尔等艺术家的杰作相遇之时，我们究竟错过了什么？这些都是本书需要解决的问题。因此，风格或形式分析等传统方法已经无法满足本书的需求。尤其是进入了后现代主义时期，对于风景画的研究已经从视觉性转向了阐释性，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等理论学说纷纷介入，为我们探讨风景画的问题提供了更为有效的途径。本书所主要采用的就是艺术社会学的方法。艺术社会学在当今的艺术史研究中，已经逐渐成为一门显学，如阿诺德·豪泽尔（Arnold Hauser）、巴克桑德尔（Michael Baxandall）、T. J. 克拉克（T. J. Clark）、托马斯·克劳（Thomas Cow）等都是这一领域的著名学者。艺术社会学将艺术视为政治、经济、宗教、历史的综合网络上的一个节点，艺术作品并非仅仅是艺术家的劳动成果，而是由它所处时代的社会环境、文化传统、经济体制、意识形态等因素决定的。因此，相对于注重艺术家个体作用的研究而言，“社会学的艺术史家则坚称他们面对的是真实存在而非想象的艺术实践……（他们）力图向我们揭示的是艺术在社会中的‘真实’的情境。”²所以，在分析具体的艺术作品的过程中，本书试图重构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英国乡村的现实情境，重点探讨了英国

2. 邵宏. 美术史的观念 [M]. 杭州: 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2006: 247.

长久的田园诗传统、绅士和贵族的趣味、根深蒂固的道德经济和土地制度、战争期间的国家意志对风景画中农民形象的建构作用。

同时,本书还借鉴了斯图亚特·霍尔(Stuart Hall)的“文化表征”理论。霍尔在他的《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一书中提出了“文化的循环”:即意义在特定的社会关系与权力关系中通过语言和表征而生产和建构出来,同时这种被生产出来的意义又反过来与权力勾结,参与权力的实践。简而言之便是,文化表征在权力支配下进行意指实践,权力通过文化表征来规范行为、建构主体,并将自己“自然化”为一种习惯和共识。这一理论对于本书的研究助益匪浅,因为它向我们揭示了:风景画是意识形态与权力关系的表征,同时也是一种文化实践的工具,它参与了各种规则、标准、知识、惯例的建构,并将其自然化,假扮成“天生如此”的面貌或者一种“必然的存在”。也就是说,风景画与权力话语之间存在着一一种双向互动的共谋关系。

“风景与权力”一直是艺术史学者们所热衷讨论的问题。1990年,在芝加哥大学继续教育办公室的推动下,W. 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安·亚当斯(Ann Adams)、安·伯明翰(Ann Bermingham)等学者共同参与了一次名为“风景的权力”的研讨会,学者们就“风景与记忆”“空间与权力”“异域与他者”“田园与牧歌”等主题递交了论文,讨论了风景作为“心理或者意识形态主题的一个寓言”是如何被编码和建构的。在西方学界也出版过一些非常有见地的相关著作(遗憾的是国内对这方面的专门研究和讨论十分少见),如《风景的阴暗面:1730—1840年英国绘画中的乡村穷人》(*The Dark Side of the Landscape: The Rural Poor in English Painting 1730-1840*) (John Barrell, 1995),《风景与意识形态:1740—1860年英国乡村传统》(*Landscape and Ideology: The*

English Rustic Tradition, 1740-1860) (Ann Bermingham, 1989), 《阅读风景: 国家, 城市, 资本(文化政策)》(*Reading Landscape: Country, City, Capital (Cultural Politics)*) (Simon Pugh, 1990), 《风景与权力》(*Landscape and Power*) (W. J. T. Mitchell, 2002), 《劳苦与充裕: 1780—1890年英国农业风景中的形象》(*Toil and Plenty: Images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England, 1780—1890*) (Christiana Payne, 1994) 《风景与记忆》(*Landscape and Memory*) (Simon Schama, 1996), 《英国风景画》(*British Landscape Painting*) (Michael Rosenthal, 1982) 《社会的形成与象征的风景》(*Social Formation and Symbolic Landscape*) (Denis E. Cosgrove, 1998)等, 这些著作运用符号学、社会学、现象学以及心理学的方法对风景画进行研究, 给了笔者很大启发。英国学者约翰·巴瑞尔(John Barrell)的《风景的阴暗面》从社会艺术史的角度论述了18世纪上半期至19世纪中期英国社会的阶级关系以及意识形态对于风景画中穷人形象的影响, 强调了绘画对于穷人的表征是由富人的需要决定的。同时, 由于巴瑞尔专门从事英国十八、十九世纪的文学、历史和艺术研究, 他在他的诸多著作中也常常侧重讨论英国的文学传统对于风景画的影响。在《风景的阴暗面》中, 他的主要论证方法就是将18世纪的诗歌与乡村风景画进行比较分析, 他认为文学对于传统的反叛要比绘画来得迅速, 他发现18世纪上半期英国乡村风景画所呈现出的理想主义倾向和蒲伯(Alexander Pope)、戈尔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约翰·盖伊(John Gay)等人的田园诗有着密切的联系, 而后来风景画所呈现的自然主义转向也是受到克莱布(George Crabbe)、华兹华斯(William Wordsworth)、司克特(Walter Scott)等人的诗歌的影响。在文中, 他提供了翔实的文学资料, 并且梳理出诗歌与绘画两条相互印证的线索, 具有很大的参考价值。而安·伯明翰(Ann Bermingham)的著作则着重运用社会学

的方法探讨风景画与国家意识形态以及时代趣味的关系，她的研究范围主要是 18 世纪中期至 19 世纪中期的英国艺术。在《风景与意识形态》一书中，她从 18 世纪英国阶级社会的形成、经济政治改革以及社会道德礼仪等方面论述了这些因素对于乡村风景画的建构，她的立场与巴瑞尔相同，两者都批判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并极力揭露乡村风景画中所掩盖的阶级压迫。与此类似的学者还有西蒙·佩什（Simon Pugh）、迈克尔·罗森塔尔（Michael Rosenthal）、克里斯蒂安娜·佩恩（Christiana Payne）等，他们的著作对于本书也启迪颇深。

最后，在进入正文之前，有必要对两个重要概念进行说明：

首先，对于“乡村风景画”（rural landscape）的界定。克里斯蒂安娜·佩恩认为：“农业风景画（agricultural landscape）”表现的是在田间工作的农民形象。这种绘画类型包括两个方面：风景画和风俗画（即日常生活的绘画）。”¹与此相似，本书所研究的乡村风景画与一般意义上的风景画不同，它并不是单纯的自然风景，而是有农民形象存在的风景。在某些作品中，由于农民形象占据了画面主体，而风景只是作为画面背景，使作品类似于风俗画（如乔治·莫兰德的作品），但依然归入乡村风景画的讨论范围内。

其次，对于“农民”的界定。在 18 世纪至 19 世纪的英国，根据占有生产资料的不同，农民分为很多种，有自己拥有农场的农民（farmer），有租种别人土地的佃农（peasant），佃农按照普通法和习惯法的区别，又分为自由持有农和公簿持有农，还有通过各种手段谋生的茅舍农（cottager），以及在农场工作的雇佣工人。²本书将研究范围限制在不占有土地或者在圈地运动中被剥夺了共有权的作为无产者的农民，而不包括土地贵族、农场主和农业资本家。

1. PAYNE C., *Toil and Plenty: Images of the Agricultural Landscape in England, 1780-1890*[M]. New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4:2.

2. 沈汉. 英国土地制度史 [M] 上海: 学林出版社, 2005.

目 录

第 1 章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英国乡村风景画与英国乡村 /1

第 2 章 来自旧时代的怀念：庚斯博罗的晚期作品 /15

1. 学院派的要求 /18
2. 田园梦 /27
3. 贵族趣味 /37

第 3 章 关于劳动的美德：斯塔布斯与莫兰德 /45

1. 关于劳动的美德 /46
2. 激进主义的嫌疑 /61
3. 勤劳 = 富足 = 英国；懒惰 = 贫穷 = 法国 /69

第 4 章 社会化的风景：康斯太布尔的早期风景画 /79

1. 拿破仑战争时期的英国乡村 /80
2. 社会化的风景：康斯太布尔的早期风景画 /85

结语 “神圣的、沉默的语言”：作为意识形态的风景 /103

参考文献 /109

后记 无边的风景 /115

第1章

18 世纪末至 19 世纪初的 英国乡村风景画与英国乡村

这是傍晚夕阳映照下的一处偏僻的村庄，一个伐木归来的男人正扛着一捆柴薪走向自己的家门。他的家是一所破旧的茅屋，茅屋门前聚集着几个年轻美貌的女人和一些正在快乐玩耍的孩子。他们是他的家人：他的妻子，他已经成年的女儿们（或者可能是他的姐妹）以及他几个幼小的孩子。

《在茅屋门前玩耍的孩子们》（*Cottage Door with Children Playing*）（图1）是托马斯·庚斯博罗（Thomas Gainsborough）作于1778年的作品。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庚斯博罗创作了一系列描绘乡村题材的作品，如《伐木者归来》（*The Woodcutter's Return*, 1772—1773）、《湿地》（*The Watering Place*）（1777）、《茅屋门前》（*Cottage Door*, 1780）、《茅屋门前的女孩和小猪》（*Cottage Door with Girl and Pigs*, 1786），等等。与此同时或者稍晚，乔治·斯塔布斯（George Stubbs）、乔治·莫兰德（George Morland）、康斯太布尔（John Constable）等艺术家也创作了描绘农民生活或者乡村风景的作品，例如斯塔布斯的《收割者》（*Reapers*）、《收干草者》（*Haymakers*）（都作于1785年），莫兰德的《放牛人与挤奶女》（*Cowherd and Milkmaid*, 1792）、《挖石头的人》（*The Gravel Diggers*），康斯太布尔的《萨福克的耕作风景》（*Landscape, Ploughing Scene in Suffolk*, 1812）、《造船》（*Building Boat*, 1814）以及英国水彩协会的会员们对于农民的描绘等。与18世纪中期乔治·兰伯特（George Lambert）¹、理查德·威尔逊（Richard Wilson）²等人的古典主义风

1. 乔治·兰伯特（1700—1765）：最早专门从事风景画创作的英国画家之一，他最著名的作品《巴克斯山的景色》（1733）描绘了伦敦南部的美丽景色。威廉·荷加斯（William Hogarth）认为兰伯特的作品足以与法国风景画克劳德·洛兰（Claude Lorrain）匹敌。虽然他从未到过意大利，但他依然受到古典主义风景画的很大影响。

2. 理查德·威尔逊（1714—1782）：威尔士风景画家，1750—1757年在意大利进行创作，1768年成为英国皇家美术学院成员，主要创作意大利古典主义风景画和以古典文学为题材的风景画，其风格受克劳德·洛兰影响较深。他是英国第一位主要从事风景画创作的艺术家，被誉为“英国风景画之父”。



图1 庚斯博罗，《在茅屋门前玩耍的孩子们》（*Cottage Door with Children Playing*, 1778）

景画相比，这些作品出现了明显的现实化和本土化倾向：以往的洛兰式的理想化风景变成了具有英国特色的茅屋和田野，以往闲散优雅、谈情说爱的牧羊人和牧羊女变成了勤勉持家、任劳任怨的伐木者、收割者和耕夫。诸多学者指出这时期的乡村风景画表现了“现实的乡村生活”，例如雷诺兹就曾赞扬庚斯博罗的乡村风景画之所以美是因为他对自然的细致观察；莫兰德笔下的农民形象之所以会触犯绅士们的审美，是因为他“忠于自然”；而康斯太布尔的声誉则主要来自于他对于乡村景色以及瞬间光影与空气感的细节描绘。

诚然，正如克里斯蒂安娜·佩恩所说：“无论他们（艺术家）如何夸大农业工人的优雅与愉悦，他们确实在一定程度上描绘了当时的农业活动。由于机械化对英国农业发生影响的速度十分缓慢，直至19世纪末，艺术家还可以无须跑太远就能看到人工收割小麦和用干草叉堆积

草垛的情景。”^{[3]2} 我们可以从庚斯博罗的画中看到栖身在简陋的茅舍中的农工家庭，在斯塔布斯的画中看到手持草叉在田间劳动的男女们，在康斯太布尔的画中看到在广袤的田野上赶着毛驴犁地的农民。的确，在这个时期，工业革命对于英国乡村的影响远远不如对城市的影响那么巨大。然而，虽然大部分农民仍然生活在乡村，并且从事着与以往毫无差别的劳动，但是他们的身份已经发生了本质上的改变：由自耕农变成了农场中的雇佣工人。“在 18 世纪晚期至 19 世纪的英国，尤其是南部郡，自己占有土地并且在自己的土地上工作的人已经非常少了，自耕农已经变成了一种幻想。”^{[3]7} 农民这种身份转变无疑与圈地运动有关。

我们对于圈地运动的理解往往来自于 16 世纪的英国空想社会主义者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的《乌托邦》（*Utopia*）¹，莫尔是在出使欧洲大陆期间利用闲暇时间撰写这部著作的，他将当时进行的圈地运动斥责为“羊吃人”的暴力运动。其实，圈地运动早在中世纪就已开始，1235 年的《默顿条例》和 1285 年的《第二威斯敏斯特条例》就已规定：“授权庄园领主圈占自由佃户不需要的荒地。”在 15 世纪，人们就已经发现在土地上种草要比种植谷物需要的劳动力少，于是大片耕地被改为牧场和草地。但是随着耕地的急速减少，许多农民失业，一些村庄荒芜衰落，圈地运动逐渐受到限制。自 15 世纪末至 17 世纪，英国议会多次指出圈地的危害，并通过法案，对圈地运动加以干涉。17 世纪，由于内战的爆发，英国政府无力顾及圈地，政府控制圈地的计划中止了。至 1688 年时，圈地重新被合法化。这是因为光荣革命改变了国家的性质，使议会取代国王成为最高权力机构。当时的英国议会主要由土地贵族控制，随着农业商业化和农业改革的

1. 全名为《关于最完美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全书》，约于 1516 年出版。

进行，他们愈益将农业经营科学化，“他们开始精确计算农业的费用，投入所产生的利润，他们不能容忍粗放的、效率不高的、不能增加产量的农业生产方式。然而18世纪英国的农业粗放而又原始，广大土地仍然处于荒野状态。敞田的存在，阻碍了农业技术的推广。……因此，他们认为必须消灭敞田。”^{[4]248}于是，18世纪的圈地法案呈狂飙式的增长，在1717至1727年国会批准通过的圈地法案仅为15件，但到了1728—1760年便已增至226件，1797—1820年，即拿破仑战争时期更是猛增至1727件。^{[5]62}于是，从17世纪到18世纪，英国的土地从小乡绅和自耕农的手里不断地转向由商人来补充的土地贵族手中，这一过程直至19世纪初仍在持续。

然而正如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所说：“我们首先应当牢记，18世纪推动农业改良的精神并不是——像一些冗长的著作所说的那样——产生于开发贫瘠的荒地以便‘为越来越多的人口提供粮食’的利他主义的愿望，而是产生于增加地租和更多利润的愿望。”^{[6]238}因此，圈地运动满足的是土地所有者的利润追求，同时却给下层农民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这是因为圈地运动主要是对公地的圈占。所谓公地，即若干土地所有者的土地混杂分散分布的大片土地。公地制度在英国也有十分悠久的历史，它起源于欧洲领主制时期。在中世纪时，英国全境范围内都广泛存在着公用可耕地和公用荒地，它们常常是集体共有物，没有明确的主人，甚至大部分没有得到开垦。尽管公地的价值并不高，但农民却可以在中获得很多收益，他们可以在公地上放牧、捕鱼、伐木、挖煤、拾薪，“贫穷的织工可以在公地上摊晒漂洗染色的布帛，穷人可在公地上搭建简易的小屋以栖身”，等等。直至18世纪，英国乡村仍存在相当数量的平民主要依靠

在公地上耕作或放牧为生。此外，还有许多无地的平民，由于他们不拥有也不租种任何土地，公地便成为他们生活资料的全部来源。在1767年，密德兰的一本小册子的作者写道：“在几乎所有的敞地教区中，有一些人有房屋，并在旷野中有小块条地，拥有养一头母牛或三四只羊的共有权，通过它们的帮助，靠小商业或日常劳作获得的利润，他们过着一种非常舒适的生活。”“他们用稻草盖他们农舍的屋顶，在冬季喂他们的奶牛，后者在一年的5至10月里提供给他们全家早餐或晚餐时饮用的牛奶。这些人几乎完全不赞成圈地。”^{[4]238}因此，公地对于下层农民的生存来说，意义是十分重大的。

但是，公地上的共有权并没有写进英国的成文法和普通法，它只是在习惯上存在于英国农业土地制度之中，“习惯对于英国人来说具有强大的力量，它甚至相当于法律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它是约定俗成的，它是没有明文可以遵循的，因此它是不停变化的，模棱两可的。”^{[7]159}所以，人们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他们在公地上拥有的权利，也就无法在土地被圈占后得到相应的赔偿。受危害最深的莫过于茅舍农，由于他们不拥有任何土地，多半是从事多种职业的手艺人或者在收获时节充当临时雇工，公地便成为了他们的主要生活来源，“当圈地在一个又一个的村庄摧毁了勉强维持生存的贫民经济时……茅舍农无法从法律上证明他们的这种权利，因而极少得到赔偿。那些能够证明自己拥有这种权利的茅舍农获得了一小块土地，但仍不足以维持他们的生存。”^{[6]239}这里举一个例子：在1735年和1738年的沃里克郡的艾色斯通镇的圈地运动中，大自由持有农布雷斯特里奇提供给茅舍农80英亩土地，作为他们失去在整个土地上放牧权的补偿。120名茅舍农认为这样做使他们的利益

受损，因为根据共有权，他们每年有 10 个月都可以在公地上放牧 2 匹马和 2 头牛。^{[4]244} 然而圈地使他们失去了一切。斯内尔 (K. D. M. Snell) 指出在教区土地被圈占后，失业率呈季度性的上升，“占有公地或者共有权的人们在圈地之后得到了补偿，但是这种补偿甚至还不够他们给自己的小片土地扎围栏的价钱，于是他们便将地卖给了地主。失去了公地上的牧草和燃料，下层劳动者们的饮食也受到了极大的损害。在圈地的教区，农民的孩子极少能喝到牛奶；而燃料的缺失则意味着农民们再也不能自己烤面包吃，并且也不能在冬天为他们的居所取暖。……农民们以前拥有的多种多样的食物与燃料来源如今只剩下两个——工资和救济金。”^{[3]12} 甚至连圈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阿瑟·扬 (Arthur Young) 在 1801 年时都不得不感叹圈地运动对下层劳动者造成的巨大打击：“二十个圈地法案中有十九个都是损害穷人的利益的……在这些教区的穷人可能会说：‘议会应该对财产宽容一点；我所知道的一切就是，我有一头奶牛，而议会法案把它带走了。’而这的确是事实。”^{[3]12}

最初“圈地”的定义是“在土地四周用连续的篱笆、栅栏、墙或沟渠将敞田和公地圈围起来。”^{[4]120} 它本来只是一种用来改善农业生产的技术性措施，然而它却造成了严重的社会后果。骚塞 (Robert Southey) 在 1816 年指出，圈地运动已经导致自耕农的彻底消失，“一个人数众多、最有用、最受人尊敬的来自小农场主的阶级，已经沦为了全日制的雇佣工。”^{[3]12} 这种全日制的雇佣工“居住的房屋和吃的食品与早期工厂中贫穷的学徒一样差，他们住在干草棚里，随时可以被解雇。……生活必需品迫使他们沦为某个人的奴隶，他们住的是租来的农舍，整年只能为某种程度的低工资而从事劳